

双周 学术

大型政治共同体的逻辑

——读潘岳同志文章《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

潘 维

近日读到潘岳同志的奇文，比较五胡入华的300年和日耳曼各部入主西罗马的300年。文章说明，这两个类似的重大历史事件塑造了中西后来不同的历史路径和不同的政治结果：一个是族群的分散封建，迄今再未有罗马大一统；另一个是胡汉融为一体，一扫汉末至三国两晋到南朝的颓废，恢复了郡县大一统的勃勃生机。

这篇文章带着股“仙气”。其一，那段300年极为血腥的中国史在他笔下变成了一部激动人心的浪漫史，“乱华”变成了胡汉文化大交融的“入华”。其二，华欧那各自300年的历史纵横交错、非常混乱，但被他以诗词式的凝练文笔娓娓道来，居然变成了线条清晰的简史，只用了2.7万字。其三，他用一个个精心挑选的动人故事串联那些惊心动魄的混战，更串联对中西史家重要学术观点的评议，建构了一个能与西方史观比肩的、非常中国的“民族”史观。

在潘岳看来，就形成政治共同体而言，基督教会的“普世教会”不起作用，不敌日耳曼族属分散的文化基因。然而，潘岳想说的显然不止于“罗马抛弃罗马”“中华选择中华”的历史“路径依赖”。潘岳的文章旨在弘扬一种史观：中华政权的“正当性”来自族群大融合，来自继承秦汉以降的大一统制度。

有个疑问长期萦绕在我脑海里：中华为什么在3000年前就形成了庞大的政治共同体，而在中华以外直到300多年前才刚开始形成这种政治共同体？潘岳此文探讨两地异族入侵形成的不同历史路径，并非为回答上述问题而作，但也不无关联。他的答案似乎是：特殊的历史文化塑造了特殊制度；日耳曼的文化基因与凝聚大型政治共同体有明显张力。

武王伐纣成功两年后就去世了。其幼子周成王在周公旦的辅佐下创立了中华封建大一统。成王于公元前1021年去世，迄今3042年。说中华大一统有3000年历史并非传说，而是信史。2240年前，秦始皇开创了延续至今的中华郡县大一统，更是举世皆知的事。

“政治共同体”指的是“国土、国民、国民政权”的有机共同体，或用基督教的概念是“三位一体”。大一统是庞大的政治共同体，“大”指的是广土众民，“一统”指的是有统一管理国土与国民的政府。“政治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概念。多元一体，“元”指的是“文化共同体”，但“一体”指的是“政治共同体”。所有“国家”内，即所有政治共同体内，都存在多元化。

自西周以来，“大一统”本身就是中华政权“正当性”的来源。康熙年间选2000年来传颂的佳文两百余篇，编成《古文观止》，其中包括先秦政论文《春王正月》。那是最早叙述政权正当性源于“大一统”的出色文章，千古传颂至今。潘岳文章写的是中华和欧洲非

常血腥的那段历史，但究其实质却是首“大一统”赞美诗。大一统就是中国，中国就是大一统。何以中华政治共同体形成得那么早，而且韧性强大到延续3000年至今？潘岳的文章刺激笔者归纳出一种粗略答案，由下述四种原因构成。

第一是社会平等。社会高下分层越含混、越不稳定，大型政治共同体就越容易形成和稳固。社会分层越清晰、越稳定，大型政治共同体就越难形成和稳固。

中华有“四民分业”，但“百姓”平等，构成了“编户齐民”的基本条件，也是“大一统”的基本条件。既然“百姓”平等，编户齐民，就没有欧式的“阶级文化”。无论建筑、还是文学、还是艺术，都无“贵族”专属之类。早年的“五胡”被这社会平等吸引，最后满族入主中原，也被这社会平等吸引。平等的社会生活非常有魅力，是“华夏无外”甚至“天下无外”的原因，是凝聚大型政治共同体的基础。

第二是官民相互依存。“民”不再分，甚至可以“编户齐民”，政治共同体里就只剩下了“官、民”两种。官民相互依存，则政治共同体稳固、兴旺，可以稳固支撑较大规模。官只“代表”某个部分的民，大型政治共同体就难以形成和稳固。

围绕“为什么需要政府，政府何以兴衰”的重大疑问，政治学形成“元理论”。西方近代以来的答案是“契约”，民与民的“授权契约”衍生出民与官的“授权契约”。契约论充满了世俗农耕人难以理解的神秘：谁给谁、在何时何地，怎样“授权”，授了什么“权”？契约论显然不是大型政治共同体的逻辑，不是国土、国民、政权三位一体的逻辑。与近代西方创造的“契约论”形成鲜明对照，中华3000年亘古不变的因果答案是“民本”：政权因民之整体福祉需要而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不是就一时一事民调而来的“民意”，而是百姓对政权的普遍“信任”。民心就是政权的“正当性”，所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科举考试是选官制度，考试内容是“四书五经”。开宗明义，四书五经的第一本、第一页、第一句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做官就要入心入脑地修习中华的家庭伦理道德，以百姓为自家至亲，直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民营私，官奉公；民传子，官传贤。于是，中华大一统是个同心圆状的政治共同体，只要官以民为中心，民就以官为圆心。一旦官营私，“民本”变成“官本”，就“失民心者失天下”了。

第三是纽带的天然性。政治共同体越依赖人造意识形态凝聚，就越脆弱；而越依赖天然之民之所需凝聚，就越稳固、耐久。人可以造意识形态，当然也会造与之矛盾

的意识形态，导致派别林立。“天然纽带”指的是育小养老的人类繁衍。家庭是为了育小养老，政治共同体的天然本质是育小养老的互助。无论古今中外，所有政治共同体都在育小养老上组织互助，即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然而，世界上大多数政治共同体特别强调某种宗教和意识形态，也就普遍有脆弱和难以耐久的问题。与之对照，中华历朝历代都声称“本朝以孝治天下”。家庭伦理“孝悌”衍生出社会伦理“忠信”，社会伦理“忠信”又衍生出政治伦理“礼义廉耻”。中华农耕人向往遥远未来的“大同”，现实中则脚踏实地追求全体国民的“小康”。继承中华道统，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就是领导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党的奋斗目标是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显然在强调政治共同体组织育小养老互助的天然责任。

第四是生产方式的先进性。近代以来还出现了影响政治共同体大小强弱的四大要素，即生产方式进步引发的财富形式变迁。

人类大约在7000年前开始有了“产业”，完成了驯化野生的牛羊猪和培育野生植物为小麦大麦、小米大米，还有中南美洲的玉米和薯类。种植和养殖财富就是“第一产业”。但仅在300年前崛起了“第二产业”，制造财富成为财富的主体。紧接着又在最近数十年崛起了“第三产业”，创造的无形财富变成财富的主体。这300年的技术进步，从种植养殖财富到制造财富到创造无形财富，给了我们一个近代的新史观的视角。

潘岳的文章赞美汉胡大融合，表达了他对中式大一统与西式封建的鲜明观立场。为澄清身在何处，我在此概括世上的五类史观：1.历史是单一神的杰作，2.历史是循环的，3.历史是进化的，4.历史是群体内部种族、等级、阶级、上中下利益集团彼此斗争和重组的结果，5.历史是政治共同体从小到大的凝聚的结果。可以把这五种史观合并简化为当今的两大类史观：

第一，人类历史主要由技术进步和群体内部利益集团的斗争推动。如此史观催生了如下的“自由”价值观：从群体中独立解放的“个人自由”，到集团之间进行利益斗争的“社会自由”，到集团争夺控制政府权力的“政治自由”。这史观强调“分”的社会价值，强调社会集团的强弱胜负是政治分析的基本单元。

第二，人类历史主要由技术进步和政治共同体的治乱兴衰竞争推动，比拼的是政治共同体的内聚力和适合先进技术创新发展的环境。如此史观催生了“大家庭”价值观：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天下一家。这史观强调“合”的社会价值，强调能团结内部社会的政治共同体本身是政治分析的基本单元。

正是在第二种史观基础上，笔者对潘岳的文章产生了强烈共鸣。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家训 品鉴④



王 杰

《颜氏家训》是我国南北朝时北齐文学家颜之推的传世代表作。他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处世哲学，写成《颜氏家训》一书告诫子孙。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也是一部学术著作。这本书的内容涉及诸多领域，强调教育体系应以儒学为核心，阐述立身治家的方法，尤其注重对孩子的早期教育，并对儒学、文学、佛学、历史、文字、民俗、社会、伦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文章内容平实、语言流畅，具有一种独特的朴实风格，对后世的影响颇为深远。可以这样说，古今家训，以此为祖。

颜之推(531年—约597年)，是中国古代文学家、教育家。他年少时因不喜欢虚谈，转而研习《仪礼》《左传》。由于博览群书、见解独到，且文采飞扬、辞情并茂，得到南朝梁湘东王萧绎的赏识。侯景之乱后奉命校书，在西魏攻陷江陵时被俘，被遣送到西魏；后投奔北齐，历20年，官至黄门侍郎。北齐灭亡后，被北周征为御史上士，北周被取代后又入隋朝做官，于开皇年间被召为学士，约于开皇十七年(597年)因病去世。

颜之推写这本书，是希望能给自己的子孙一些有益的训诫。他尤其感慨，颜氏家族虽然素来“风教整肃”，但是自己因9岁就遭到家难，父亲过世，没有受到严格的管教，长大后养成了一些坏习惯，经过长久的磨炼才改掉。他说自己“每常心共口故，性与情竟，夜觉晓非，今悔昨失，自怜无教，以至于斯”。意思是，自己经常心里跟嘴巴作对，理智与情感冲突，夜里觉察到白天的不对，今天追悔昨日的失误，自己哀怜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以至于落到这种境地，所以他不希望自己的子孙再蹈覆辙：“故留此二十篇，以为汝后车耳。”这就是《颜氏家训》的由来。

可以说，《颜氏家训》是一个负责任的家长深思熟虑的产物，包含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精髓。颜之推的三个儿子颜思鲁、颜思楚、颜游秦，四个孙子颜师古、颜相时、颜勤礼、颜师德，都有名气。尤其是嫡长孙颜师古，更是唐代最著名的音韵学家、训诂学家和文学家之一。颜之推四世孙颜昭甫、五世孙颜元孙、颜惟贞均属名家。六世孙有名的更多，尤以“颜氏三卿”——颜真卿、颜杲卿、颜春卿更为显赫。颜真卿受封“鲁郡开国公”，世称颜鲁公，谥号“文忠”；颜杲卿被封为常山公，谥号“忠节”，二人并称“双忠”。

因为《颜氏家训》共有7卷，包括20篇，体例宏大，内蕴丰富，限于篇幅，不能逐一赘述，简单介绍几个方面的内容：

在第一篇“序致”中，颜之推认为，圣贤的书籍，教诲人们要忠诚孝顺，说话要谨慎，行为要检点，建功立业使美名远扬，所有这些都已讲得很全面详细了。魏晋以来，所作的一些诸子书籍，类似的道理重复而且内容相近。如今之所以要再写这部《家训》，并非是敢于给大家在办事、为人处世方面作什么规范，只是用来整顿家风，教育子孙后代。同样的言语，因为是所亲近的人说出的就容易相信；同样的命令，因为是所佩服的人发出的就愿意执行。

在“教子”篇中，颜之推认为，“父母威严而有慈，子女畏惧而生孝”，父母既威严又慈爱，子女就会敬畏谨慎，从而产生孝心。世上所有父母，对子女不加教育，只是一味地溺爱，常常不以为然。要吃什么、要干什么，任意放纵孩子，不加管制，该训诫时反而夸奖，该训斥责骂时反而和颜悦色，到孩子懂事时，就会把错误当成正确。到骄傲怠慢已经成为习惯时，才开始去加以制止，为时已晚，就算把他们鞭抽棍打至死，也难以再树立父母的威信。

太过仁慈的溺爱让孩子缺乏管教，最终使其受到伤害，成为道德败坏之人；而太过苛刻的教育方式则会让其产生逆反和叛逆心理。所以，最合理的教育方式应该是威严而又慈爱，恩威并施、宽猛相济。

在“兄弟”篇中，颜之推认为，兄弟是形体分而气质相连的人。当他们幼小的时候，父母左手牵右手携，前襟后裾，吃饭同桌，衣服轮流穿，学习用同一册课本，游玩去同一处地方，即使有荒谬胡来的，也不可能不相相爱。等到进入壮年时来看，议题式的讨论、辩论才能产生信息互为补充、观点碰撞交锋的作用，更容易掌握实际情况，得出正确结论。

第三，不要产生智力优越感。我们进行调研前首先要以问题为导向查阅背景资料，浏览不同渠道的信息，拼凑出关于调研题目的大体样貌，但是不能据此着急下结论，使思考的过程止步于书斋。毛泽东真正认识和了解农村尚且用了六七年的时间，在《关于农村调查》中，他这样谈道：“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富农与地主的问题。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调查形成一股热潮，以陶孟和、李景汉、孙本文、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改变传统社会学方法，深入乡村，关注平民，寻找国家羸弱、社会衰败的深层原因，形成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国土地利用》《江村经济》等经典之作，他们并没有自得于智力优越感，而是选择了用脚步丈量中国。只有把研究问题置于经验现场，才能接近事物的真相，得出的结论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作者单位：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办公室）

《颜氏家训》：古今家训，以此为祖

王 杰

常重视家庭的教育功能，特别强调要重视早期教育。做父母的，不要以为先贤圣哲说的道理，让孩子背会了孩子就能够做到。有关人生、有关幸福、有关如何做人的事情，父母应该多和孩子交流和沟通。要注意采用孩子能够接受的方式来沟通和引导，需要注意身教胜于言传，把提要求变成提供支持，很多家长和老教师习惯于用指责和控诉来代替沟通和引导，这是不对的。

当前社会的家庭教育存在忽略个体差别，通过比较、排名等方式过分向成绩领先的孩子看齐的现象，这也是存在问题的。孩子的成长本来就存在个体差异，教育要“守道待时”，把握住孩子成长的关键期，绝不可拔苗助长。《颜氏家训》还提到父母要有公平之心、偏爱和偏心对孩子的成长都是有害的。在现代教育中，这种观点可以进一步引申为要尊重孩子的多元化和差异化，要用多元化、差异化的眼光去看待孩子的优缺点。

第二，“教”重于“养”，品格教育重于技能培养。

现代社会中，家庭、学校、社会是教育的三个主要场所。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孩子的教育主要由学校和社会来完成，使得许多家长偏重于“养”，而不重视“教”。重视物质上的满足，忽视品行上的教育，认为给孩子吃饱穿暖就可以了，极尽所能为孩子提供物质上的满足，认为教育是学校和社的事情。这种认识就大错特错了，“养不教，父之过”，对于孩子的教育培养，引导孩子正确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正确认识自己的人生，树立正确的三观，走好人生的第一步，上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扣好人生的第一颗纽扣，更应该是由家长来完成的事情，而不能全部推给学校和社会。

现在许多父母还容易犯的一个认知错误，就是过分强调对孩子“知识技能”的培养而忽视品行上的教育。正如《颜氏家训》中也谈到的，“汝曹宜以传业扬名为务，不可顾恋朽壤”，教育后人要做事业，做有意义的事情，要修身扬名，要传道立事，这样才能不愧于生命、不愧于祖先、不愧于后人。所以，现代家庭教育不仅应该关注孩子的生活和身体健康，更应该注重孩子的品格培养，因为决定孩子一生的，不是学识、才华、能力、财富，而是健全的人格、高尚的品行素养、良好的行为习惯。

第三，做好情绪管理，保持良好心态。《颜氏家训》中提到“宇宙间臻其极，情性不知其穷”“唯在少欲知足，为立涯限尔”。告诫子孙在贪欲面前一定要“止足”，要划清欲望的边界。同时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也要懂得“知足”的道理。知足者富，知足者不辱，知足者常乐。

当今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孩子们缺乏自控力，会有很多的诱惑、需求和欲望，许多家庭对于孩子的任何需求都爱于一种过度满足的状态，却忘记了溺爱不是爱而是害的道理。《颜氏家训》中有许多强调要明理节欲以及知足少欲的思想，可以总结为八个字，“欲不可纵，志不可满”。欲不可纵讲的是培养自控力，志不可满讲的是情绪态度上的谦谨慎慎。

《颜氏家训》对后世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宋代以后，影响更大。宋代朱熹的《小学》，清代陈宏谋的《养正遗规》等，都曾取材于《颜氏家训》。不只朱、陈二人，唐代以后出现的数十家家训，莫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颜氏家训》的影响，南宋藏书家、目录学家陈振孙誉之为“古今家训之祖”，明代学者王三聘说，“古今家训，以此为祖。”从《颜氏家训》之多次重刻，虽历千余年而不佚，更可见其影响深远。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典范教材，《颜氏家训》直接开启了后世“家训”之先河，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理论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颜氏家训》而享千秋盛名，由此可见其家训的影响之大。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重要典籍，该书不仅表现在“质而明，详而要，平而不诡”的文章风格上，以及“兼论字画音训，并考证典故，品第文艺”的内容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的现世精神上。因此，历代学者对该书推崇备至，视之为垂训子孙以及家庭教育之典范。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平“语”近人》思想解读嘉宾）

艺文 从谈

不做“过路人”式的调查研究

——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调查研究》

张 墨 宁

1938年，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讲话时提出：“要把中国考察一番，单单采取新闻记者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带有‘过路人’的特点。俗话说，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我希望你们都下马看花。”《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调查研究》一书所选的九个调研案例，就是下马看花的典范。

1961年，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把实事求是精神恢复起来，指派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分别担任组长，各带一个调查组分赴广东、湖南、浙江进行农村调查。随着中央领导同志深入到第一线摸情况，调查研究在全党蔚然成风。这次集中系统的调查研究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也是留给我们党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

参加过调研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感受，一路马不停蹄搜集到很多材料，等到调研结束，看起来占有了大量材料，但执笔者常常感到无从梳理，很难抓到要点。“首先脑子里面要有问题才能调查。你脑子里面连一个问题也没有，就去搞调查，那就会搞得没有个边。”刘少奇所谓的“没有个边”其实是淹没于材料而无法运筹帷幄、使用得当。毛泽东也曾说过，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即矛盾的主导方面。批准主要矛盾，本书选摘的《魏塘人民公社和合生产队调查》就是很好的示范。1961年中央调查组赴浙江了解到，魏塘公社地处杭嘉湖平原的水网地区，历来是有名的粮食产区，但是从1957年开始，和合生产队粮食生产的发展很不稳定，生产力遭到了相当严重的破坏，社员生活十分困难，集体经济也受到了削弱。报告陈述了亲眼看到的现象后，大胆而直接地设问：“和合生产

队出现这种严重的局面，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自然灾害？不是。据群众说，这几年的年景不错，并没有什么灾害。是不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而是‘五风’为害。”

找到了主要矛盾，开药方就不是一件难事了。写调研报告的目的不是发表观点和见解，最终要解决问题。1960年前后，公共食堂问题已成为当时社员生活中突出的矛盾，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在调研中都听到了群众对公共食堂带来生活和生产不便的诉说。由胡乔木担任组长的赴湖南中央调查组在《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提到了房屋问题，“家家户户都不定心，所谓‘鸡不在自家窝里不生蛋’。”关于不参加食堂则自留地少一半的问题，报告直接重现了群众的声音：“群众对这一点很有意见说：‘手掌是肉，手背也是肉’都是一个娘生的。为什么两样待得？”这些情况既关注政策的宏观效应，也不放过社会生活中的微观现象，既考虑群体的普遍生存状态，也不忽视个

体的直接感受。

第二，要发挥座谈会集思广益的作用。本书的附录部分介绍了陈云作专题调查研究时如何充分运用座谈会这一形式了解情况。1961年末，陈云调研钢铁工业问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主持了12次座谈会。座谈会的开法是先作报告，然后讨论综合性问题，逐一研究钢、铁、特殊钢的生产及技术已达到什么水平，存在哪些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展望今后的发展前景及问题怎样解决。这次座谈会最大的成果就是弄清了钢产量在“大跃进”中的迅速上升是以钢为纲和拼设备、拼消耗的结果。从老一輩革命家的调研风格和技巧来看，议题式的讨论、辩论才能产生信息互为补充、观点碰撞交锋的作用，更容易掌握实际情况，得出正确结论。

第三，不要产生智力优越感。我们进行调研前首先要以问题为导向查阅背景资料，浏览不同渠道的信息，拼凑出关于调研题目的大体样貌，但是不能据此着急下结论，使思考的过程止步于书斋。毛泽东真正认识和了解农村尚且用了六七年的时间，在《关于农村调查》中，他这样谈道：“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富农与地主的问题。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调查形成一股热潮，以陶孟和、李景汉、孙本文、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改变传统社会学方法，深入乡村，关注平民，寻找国家羸弱、社会衰败的深层原因，形成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国土地利用》《江村经济》等经典之作，他们并没有自得于智力优越感，而是选择了用脚步丈量中国。只有把研究问题置于经验现场，才能接近事物的真相，得出的结论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作者单位：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办公室）